

· 中国文化 ·

略论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陈德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本文重点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文章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阴阳和五行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最后简要地论述了它们在具体学科中的运用与发展,从而说明阴阳、五行范畴的重要哲学价值,这对于明白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阴阳五行;起源;形成;运用;发展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4)02-0001-05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Yin, Yang, and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CHEN De-shu

(Research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71,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the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Yin, Yang and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both being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rms. Firstly the paper makes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time clues as its major arguments. Then it proceeds to brief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wo concepts, concluding that both are of great philosophical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in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ethodology of philosophy.

Key words:Yin and Yang;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origin and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中心理论,学者们进行了不少的探讨^[1],本文仅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阴阳”是哲学的、高层次的范畴,“五行”是仅次于阴阳的、运用于具体学科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范畴。一本名为《中国哲学范畴史》的书中没有讲到“阴阳”、更没有说到“五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阴阳”、“五行”不是单独的条目,且语焉不详。阴阳五行学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笔者在这里只疏理一下它起源和形成的脉络。

一、阴阳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阴阳”作为哲学范畴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演变过程。“阴”“阳”二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阴”字的甲骨文是“𡇁”,上部是省写的“今”,表声;

下部是“佳”(鸟),表形。意为天将阴暗,鸟鸣不已,是“阴暗”的意思。“阳”字的甲骨文是“𩫑”,左边为“阜”,表示升高的意思,右边是一盏明灯,明灯升高,光明至极^[2],表示“光明”的意思。《说文·阜部》:“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阴”的本意是“阴暗”,引申为山之北、水之南。“阳”的本意是“明亮”,引申为山之南、水之北。因为我国的黄河、长江都由西向东,在北岸面向河(江),朝向太阳,故水之北为阳,南岸朝向河(江),背向太阳,故为“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阴“见云不见日”,阳“云开而见日”。所以,阴阳的本意是指是否有太阳照耀,是否能见到太阳,是一对具体概念,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阴阳”二字在《诗经》中频频出现,但都只是当

具体名词用。“阴”是“阴暗”、“阴沉”、“阴雨”的意思。如《风·邶风·终风》：“曁曁(阴沉貌)其阴(阴暗),虺虺(音 huī,雷声)其雷。”《风·邶风·谷风》：“习习(大风之声)谷风(山谷中的风),以阴以雨。”《风·曹风·下泉》：“芃芃(音 péng,茂盛貌)黍苗,阴雨膏之(阴雨像油膏那样滋养黍苗)。”同样,“阳”也只是具体名词,是“太阳”、“山南”、“水北”、“小阳春十月”、“温气洋洋”等等意思。如《风·豳风·七月》：“春日载阳(太阳),有鸣仓庚(鸟名,黄鹂)。”《雅·大雅·皇矣》：“居岐之阳(南),在渭之将(侧)。”《风·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北)。”《雅·小雅·采薇》：“曰归曰归,岁亦阳(十月,小阳春)止。”可见,“阴”和“阳”在《诗经》中只是当作具体名词来用的。《雅·大雅·公刘》：“君子阳阳(喜气洋洋)”,“既景(影)乃冈(岗),相(勘察)其阴(北山)阳(南山)。”“阴阳”二字联用在这里最先出现,只是山北山南之意,不具哲学抽象意义。

据历史记载,虢国国君虢文公在《谏周宣王(前827—前781)不籍千亩》中有“阳痹憯发,土气震发”,“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阳痹”、“阳气”皆指春天向上升发的地气。“阴阳分布,震雷出滞”,是说日夜平均分布而均等,春雷震动了蛰伏地下的虫豸,这里的阴阳指晚上和白天。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用阴阳来解释自然运动的,是西周的伯阳父(生卒年不详),他是西周时的大夫。《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三川皆震”,指公元前780年西周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发生地震。“蒸”,升也。阳气在下,被阴气所压迫,使之不能升发,阳气动于下,所以发生了地震。伯阳父对此不用迷信的解释,而是用阴阳二气“失其序”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从事物自身中去寻找原因,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把陨石和六鹢(似鹭的水鸟)退飞的自然现象解释为“阴阳之事”。《左传·昭公元年》还记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畜: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

心疾。”这是秦国医生医和首次用“阴阳”等等六气解释致病原因,是将“阴阳”引入医学的开始。再如根据《国语·越语下》记载:春秋末期越国范蠡(前536—前448年)运用“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的观点来解释天道变化的规律。以上事实说明,春秋时期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现象,有了相当的普遍性,但是还没有把“阴阳”完全提升到哲学范畴的高度。

“阴阳”贯穿在《三玄》中,它作为哲学概念,最早见于春秋时的《老子》。《老子》中“阴、阳”二字虽然各自只出现过一次——“万物负阴而抱阳”,但它的意义却不同寻常,指出了世界万物中都包含着“阴”与“阳”这两种要素。再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看,“一生二”之“二”,一般都解释为阴阳,说明阴阳在《老子》中已经不是一对具体概念了。

道家重要经典《列子》(又名《冲虚经》),为列御寇(约前450—前375)所撰,他用“阴阳”来统辖、解释“天地”的“生化”,《列子·天瑞第一》说:“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还说:“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世间一切事物的生存、变化、生长与死亡,皆缘于阴阳;《列子·周穆王第三》又说:“阴阳之气所不交,故寒暑亡辨。”如果阴阳之气不交感,世间的事物就停止变化、发展了。还在《列子·杨朱第七》中引杨朱的话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是说人对生活的要求不能贪婪无厌,如果贪婪无厌,就会造成阴阳的失衡而发生蠹害。

庄子(前369—前286)发展了道家的学说,对于“道”重点在强调它的“本根性”、“超时空性”和其存在的普遍性,世间一切事物皆统一于“道”,消除人们心中存在的事物差异性的“成见”,要让人们“忘外物”、“忘生死”、“忘是非”、“忘古今”,从而达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圣人”、“真人”、“至人”、“神人”的境界。但《庄子》除《内篇》为庄子所作外,其余皆为后其学所作,可能非一人所作,时间跨度可能很大。其中用到“阴阳”的有23处,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第一,用阴阳来解释气,《庄子·杂篇·则阳》篇说:“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即阴阳是两种最大的物

质形态的气体，继承了《老子》对阴阳的解释。第二，用阴阳来解释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内在的根源，《庄子·外篇·天运》说：“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庄子·外篇·知北游》篇说：“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大道）惛（音 hūn，通“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万物存蓄的阴阳的调和，使“万物循生”、“四时运行”、“一盛一衰”、“一清一浊”，这样世间的事物就“各得其序”。所以《庄子·杂篇·外物》篇说，如果“阴阳错行，则天地大骇。”还在《杂篇·说剑》篇中说：“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杂篇·刻意》篇也说：“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总之，阴阳运行协调和谐，四时运行得节有序。否则，如《杂篇·渔父》所说：“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第三，运用阴阳来解释社会人事现象。如《外篇·在宥》篇说：“吾又欲官（管理、控制）阴阳，以遂（顺应）群生，为之奈何？”“人大喜邪，毗（伤害）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内篇·大宗师》也说，“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这里的阴阳指自然、阴阳对于人来说，它超过父母对子女的作用。上面所引证之例子，足以说明《庄子》已经把阴阳作为解释工具，用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

晚于庄子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在其著作《荀子》中，已经用“阴阳大化”来解释天象、天地、四时，乃至怪异天象发生的原因等。如《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夫星之队（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荀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总而言之，世间的一切正常的变化、怪异的现象，以及吉凶的根源皆是阴阳变化所致。在托名管仲而成书于战国的《管子》中，“阴阳”二字频频出现，用“阴阳”来解释天地的规律、四时的推移、日夜的变化以至王霸事业的兴衰存亡的原因。如《管子·四时篇》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管子·枢言》说，“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叁也）视（生存、生活）”。还说：“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用阴阳来解释王霸事业的成功与否。进而《管子·乘马》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

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阴阳的范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

“阴阳”范畴到了成书于战国末期的《易传》，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庄子·天下篇》曰：“易以道阴阳。”是说《易》是专门讲阴阳的，这里的《易》指《易传》。在《易经》中只有一个“阴”字，《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个“阴”字一说为水之南，一说为树荫之“荫”。构成八卦的两个爻画“——”、“—”代表阴阳，按照《易传》的解释是由仰观俯察而来，“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观变於阴阳而立卦”，“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可以确定在《易经》中已有阴阳观念了。爻画有阴阳，爻位有阴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即阴阳。卦有阴阳，乾、震、坎、艮为阳卦，坤、巽、离、兑为阴卦。《易传》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阳卦奇，阴卦耦”。《易传》大讲“阴阳”，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阴阳不测之谓神”等等。《系辞传上》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3]，把“阴阳”升华到了哲学方法论的高度。

综合上述，完整的阴阳学说应该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相互对待：阴阳是构成宇宙事物的两种不同的物质实体，阴气与阳气；阴阳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势或两种状态。第二，相互含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互为存在的前提。第三，相互转化：相互消息，阳息阴消，阳消阴息，阴息阳消，阴消阳息，物极必反，促进事物的发展和转化。第四，相错相薄。由于任何事物内部都有阴阳对待、对立的矛盾运动，正如《说卦传》所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事物运动、转化的根源在于阴阳的“相错相薄”，在于“动之”、“散之”、“润之”、“烜之”、“止之”、“说之”、“君之”、“藏之”等等的推动与促进。由此，一阴一阳的对待、运动、转化，就是促进事物运动的规律。

由此可见，《易传》把阴阳提高到了方法论的范畴，它“把宇宙间的事物均概括为阴阳两种对立的物质实体和两种对立的属性、倾势和状态”。换言之，阴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指两种相互对立的气或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势”^[4]，作为解释工具的阴阳学说到了《易传》就基本定型了，为中国哲学方

法论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思维模式。

二、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五行”学说在中医,特别是在数术中得到十分广泛的运用,它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5]。中国文化十分崇尚“五”,是因为人的手指是“五”个、足趾也是“五”个,“五”是人本身所具有的定数。手指具有伟大的创造功能,人在生活中所需要而自然界没有的一切,都能通过手创造出来,手指的灵巧性和创造性,是任何东西都无可比拟的。“五”是生数中最大的数,成数全由它产生出来;同时,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产生了“五材”的观念;以自我的活动范围为中心,产生“五方”的观念;以生产活动的时间需要,产生了“五时”的观念等等,进而演进为“五行”的学说。

汉字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甲骨文是最早的规范性的汉字,其中已有木、水、火、土四个字,均为象形字,“金”是后起字,它必须是在金属出现后的事情。凉山彝族历法也把“土、铜、水、木、火”这五个物质要素用于季节的区分,但“金”比“铜”的抽象层次更高。“水”是一切生命之源,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应该是人类最先重视的物质。“火”的重视,应该是伏羲发明钻木取火之后。所以甲骨文创造了木、水、火、土这四个字。“五行”开初之名为“五材”。《尚书·虞夏书·甘誓》篇中说,“有扈氏威侮五行”,《尚书正义》释为“五行之德”,今人顾宝田等人释为五种物质材料:“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的民生日用资料。威侮五行就是反对五行学说,轻慢利用各种自然物为民造福。”^①《尚书·周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这里的“五行”,仍然指的五种材质,不同的是说明了五行的性质。水的性质“润下”,其味“咸”;火的性质“炎上”,其味“苦”;木的性质“曲直”,其味“酸”;金的性质“从革”,其味“辛”;土的性质“稼穡”,其味“甘”。祖先用自己生活中最为迫切需要的五种物质材料来解释“五行”,是最直接、最朴素的,也应该是最原始的意义。

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西周末期,生卒年不详)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交媾、交合)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增加、增益)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

杂,以成百物。”《左传·襄公二十七年^②》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杜预注“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又《周礼·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辩民器。”郑玄注:“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西周末期思想家的史伯就把五材用来解释“和实生物”这个哲学问题,是把“五材”作为方法论的开始。

《庄子·说剑》说:“制以五行,论以刑德。”成玄英疏:“五行,金、木、水、火、土。”战国末期齐国阴阳家邹衍,《史记》载他著有《主运》、《始终》、《大圣》等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全部失传。邹衍根据“深观五行消息”,提出“大九洲说”和“五德终始说”。他的“五德终始说”,是指五行之德,周而复始,循环运转,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变迁、王朝的兴衰。为了论证“五德终始说”,邹衍提出“五德相胜”的理论,他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水。”^③“五德”即五行;“相胜”,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所以,“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④他认为,每一德都有胜衰之时,历史的变迁受五德的支配,其德兴盛时,它所对应的朝代就兴旺,其德衰败时,它所对应的朝代就会衰亡。《吕氏春秋·世应》篇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螭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据考证《世应》篇为邹衍的佚文。根据上面所引用的佚文看,邹衍在五行学说方面的贡献是提出了“五德相胜”学说。

《管子》也讲五行,它用四时配五行、十干、五方,用五行配五灵、五音、五味、五色、五祀等^⑤。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是一部没有学派偏见的综合性著作,它引申发挥了《管子》中的五行学说,以十二纪首配以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五祀等,但在理论上没有重大的建树。

汉初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主持撰写的《淮南子》,是一部以先秦道家思想为主、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的论文集。在其《天文训》中

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所谓“义”、“保”、“专”、“制”、“困”,占卜用语。东晋葛洪在《抱朴子·登陟篇》中解释说:“《灵宝经》曰:所谓宝(保)日者,谓支干上生下之日也”,“又谓义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所谓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所谓伐(困)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如“保日”,指甲午、乙巳之日。“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者,木也;巳者,火也,火生于故也”,可见,“义”、“保”、“专”、“制”、“困”是表达五行生克关系的概念。《淮南子·地形训》篇还说:“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此篇中还提出了五行“壮、老、生、囚、死”过程的理论。与此差不多同时的西汉大儒董仲舒(前179—前104)著《春秋繁露》,在其《五行相生》篇中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还在《五行相胜》篇中说:“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等等。“胜”者,克制也。“五行相胜”即五行相克制的意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除论证五行相生相胜理论之外,还论述了“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董仲舒还总结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也。”^⑥东汉班固等人编纂的《白虎通义·五行篇》也说:“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五行”就是五气相继连续的运行。由此可见,至西汉时五行生克学说已经系统化,标志着五行生克学说的正式形成。

三、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与发展

以上只是对阴阳五行学说起源与形成的脉络进行了系统的疏理,简要地说明其历史过程。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之后,在医学、天文、历法、数术学等学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成了运用学科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阴阳五行学说,上述学科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大厦就会全部坍塌。

阴阳五行学说在《黄帝内经》^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并且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如在“阴阳”学说方面,认为“阴阳”是万事万物发生、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源。如在《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还论证了阴阳的无限可分性和统一性,阴阳的对待、相互作用、平衡、消长和转化的规律以及

在人体中的具体运用。如在《金匮真言论》中说:“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在“五行”方面将五行运用到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中,将其内容扩展为“五脏”、“五体”、“五窍”、“五腑”、“五华”、“五声”、“五神”、“五志”等。还结合人体生命的具体情况,论述了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理论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可见,《黄帝内经》对阴阳五行学说不只是一般的运用,还为丰富、创造性地发展这一学说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

西汉今文易学家京房(前77—前37)首先运用五行解说《周易》,创立八宫卦说、纳甲说、世应说、五行爻位说、五行爻位生克说和五行生数说。他以五行配八宫卦,以干支配以五行再配八宫卦中的各爻。以八宫卦为母,以其爻位为子,按五行关系,母子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以解说卦爻象的吉凶。从八宫卦中引出世应说,从爻位地支的五行关系,看世应的生克,用于占卜。京房在《京氏易传》中说:“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还说:“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京房还把五行生克的理论与天干地支相结合创立纳甲筮法,由此而形成庞大的数术学体系。

此外,五行学说还广泛运用于天文、历法^⑧、地学以及律学等学科中,使我国的天文、历法以及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随着五行学说的运用与发展,到了隋代,萧吉著《五行大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是我国历史上关于五行学说最为权威的著作。该书首先论述五行的名、体、性、数、生、生死所、四时休王、配支干、相杂(支干杂、方位杂),再论德、论合、论扶抑、论相克、论刑害、论冲破,进而论杂配就(五星、五色、五音、五味、五藏、五常、五事)、论律吕、论七政,包括了五行与河洛,五行与纳甲、纳音,五行与干支等各方面系统理论,是全面了解五行学说的必读之书。

阴阳五行学说,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方法论。阴阳学说是第一层次的理论,五行学说是从属于阴阳学说的,是运用于实用学科的次级范畴,它们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云南民族学院汪宁生教授则在“中华万年网”上发表《阴阳观念探秘》一文说:“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乃在其对宇宙万物的分类,曾对中国历

(下转第11页)

阴”之理，此子时亦可视为阳气潜藏待发之时。同理，申猴排在十二生肖的第九位，应该属阳，但王逵却以“申为三阴，阴胜则黠，以猴配之，猴性黠”阐释，这也是矛盾的。当然，阴胜必定阳生，故猴属阳也就不足为奇。

总之，阴阳概念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元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以之审视十二生肖的排列特性及其规律，虽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感，但不失为认识十二生肖的一扇窗户，它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我们民族象喻思维的特性，值得我们玩味思考。

注释：

- ①关于十二生肖的来源，历来多有说法，如黄建荣《十二生肖：图腾崇拜的延伸——中华民族十二生肖探源》，《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5期；黄建荣《试论十二生肖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华民族十二生肖探源之二》，《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4期等。
- ②(清)胡煦：《周易函书别集》卷十五《篝灯约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③《御定骈字类编》卷一百六《数目门》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④(明)王逵：《蠡海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⑤(明)方以智：《通雅》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⑥(明)杨慎：《升庵集》卷七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 [1] 杨庆中. 周易经传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9.
- [2] 陈鼓应,赵建伟. 周易今注今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上接第5页)

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天人感应’即以阴阳分类和五行分类为依据，而这些分类却是以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真实的联系，因而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6] 汪教授的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对于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形成与发展，需要进行认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

- ① 顾宝田、洪泽湖：《尚书译注》，《甘誓》“威侮五行”注，见第5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 ② 春秋时期起于公元前770年止于公元前476年，襄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546年，属于春秋时期。
- ③ 见《淮南子·齐俗训》篇高诱注引《邹子》。
- ④ 见《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
- ⑤ 参见《管子》的《四时》篇、《幼官》篇、《五行》篇。

- [3] (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314.
- [4] 谢谦. 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162.
- [5] 国语·卷一·周语上[M]//(清)董增龄. 国语正义. 成都：巴蜀书社，1985:91.
- [6]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僖公十六年[Z]//(清)阮元. 十三经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808.
- [7] 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M]//(清)董增龄. 国语正义. 成都：巴蜀书社，1985:1301—1302.
- [8] 任继愈. 老子新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2.
- [9]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0] 吴义方，吴卸耀. 易经百事通[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16—18.
- [11] 钱穆. 晚学盲言[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
- [12] 陈炎. 中国审美文化简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8.
- [13]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83.
- [14] (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易一[Z].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5] (明)朗瑛. 七修类稿·卷四[Z].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1—42.
- [16] 诸子集成·第七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17] 吴裕成. 中国生肖文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46.

[责任编辑 陈玉兰]

- ⑥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 ⑦ 《黄帝内经》不可能是黄帝时代所作，也不可能黄帝所作，只是托黄帝之名而已。成书时间，一说成书于战国之时，一说成书于秦汉之间，当今多数学者倾向成书于西汉时期。
- ⑧ 参见《大戴礼记·夏小正》和《礼记·月令》。

参考文献：

- [1] 陈久金. 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2).
- [2] 左安民. 细说汉字[M]. 北京：九洲出版社，2008:539、540.
-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20.
- [4] 陈德述. 周易正本解[M]. 成都：巴蜀书社，2012:41.
- [5] 贺娟. 论五行学说的起源和形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7).
- [6] 汪宁生. 阴阳观念探秘[EB/OL]. 中华万年网.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1/11/11z/11z20/11z2001.htm>.

[责任编辑 陈玉兰]